

读史阅世

赵家堡:赵宋王朝留余韵

□李湖江 文/图

1279年,崖山海战,异常惨烈!此前南宋右丞相文天祥已不幸被元军所俘,与其并称“宋末三杰”的陆秀夫、张世杰还在率军抵抗,他们护送着幼帝赵昀与杨太后来到广东新会崖山。元兵袭至,张世杰将千余条战船连在一起摆成长蛇阵,终究抵挡不住元兵的猛烈攻击。

左丞相陆秀夫见形势终难挽回,先执剑驱妻子、儿女投海,然后怀揣玉玺,背起八岁的皇帝跳入海中,杨太后闻讯也随之跳海,赵宋王朝终于覆灭。

《赵家堡族谱》所载赵若和《赵氏本末序》一文记录:“当是时,天祥被执,世杰、秀夫负帝溺海,内无良将,外多强敌,大势已去矣!”(按:张世杰系在殒葬杨太后之后不避飓风溺海。)

赵若和(1267—1332年),这位赵氏漳浦始祖,系宋太祖赵匡胤和宋太宗赵光义之弟魏王赵廷美第十世孙,被封为闽冲郡王。崖山海战之时,年仅13岁的赵若和陪伴着幼帝赵昀与杨太后,亲眼见证了历史。赵若和《赵氏本末序》记载:“连日大战,吾知势已败,与许达甫、黄侍臣(黄材)等以十六舟夺港而出,遇陈宜中舟在广崖之浅湾大会,欲往福州,以图匡复王室。船到广东南湾之七十里,飓风大作,宜中舟破,遂登合浦,予冒至浯屿之东,船亦失其红帆,就于浦西登岸……”这段话叙述了赵若和不得已落脚漳浦的经过。

为了躲避元兵后续追杀,赵若和只好更改姓氏,他在自述中也有提及:“天之降祸,世有胡元,予自逃生,讳姓黄氏,居于浦西,后徙积美鸿儒居焉,置置产业,以度时光,终身抱恨,未尝开口对人言。”

赵若和既已改姓为黄,其后代如何复姓为赵?这与一桩联姻有关。赵若和生有五子天福、天禄、天佑(出家)、天爵(出家)、天寿,天寿之子惠官娶黄材之后裔为妻,被嫉妒者告为“同姓通婚罪”,未料到一纸诉状竟使得坏事变好事,不但令赵氏复姓,而且惠官的两兄弟还因此获得官职。



赵家堡族谱记载



泮派桥

据《漳浦县志》卷三记载:“(明)洪武十八年(1385年),御史朱鉴阅读,奏请复姓,恩录明官为鸿胪序班,文官为宣伦主簿。”既恢复了赵姓,所谓“同姓通婚罪”自然也就不存在了。《赵家堡族谱》中另有一条“不许子孙与浦氏为婚”的规定,其缘由在于南宋末泉州招抚使使司提举蒲寿庚投降元朝,并杀南宋宗室。

以赵若和为赵家堡的始祖,又过了九世,赵氏家业终于得到重振。笔者在赵家堡调研时发现一条约两米长的残碑,碑文镌刻如下文字:“赵淑宽初赠奉直大夫河南彰德府磁州知州,再赠奉直大夫户部陕西清吏司员外郎。赵范累受奉直大夫户部贵州清吏司郎中,再授中(以下缺字)。”由此可见,赵若和九世孙赵淑宽(1505—1574年)已为官一方,而赵淑宽之子赵范(1543—1617年)的官职则更进一步。如今在漳浦县东40里、规模宏伟的赵家堡正是由赵范开始兴建的。

《福建通志》卷三十四载有“赵范”条目,简要记载了他的生平履历与事迹:“赵范:字范之,漳浦人,隆庆辛未(1571年)进士,知无为州,置学田,以贍贫士。调磁州,有岐麦芝草云瑞,升户部郎中。督饷雁门,有功,赐金币,擢浙江按察副使,捐俸兴水利,值大风雨,恐暴涨坏堤,自出行,水船覆,漂流数里许,巾挂枯柳而止。一老隶随拯之,得不死,以亲老告归。遇岁歉,多方设赈,里数千人。”

据赵范《硕高筑堡记》,他辞官之后回归乡里,因苦于盗患,又喜爱山林,于是选址在漳浦硕高山西北麓建筑楼堡。楼堡建成之后,其子赵义(1590—1640年)又修建了外城,原先的楼堡就居于内城。《漳浦县志》载:“赵公瑞,范子,以祖、父荫,授中书舍人。”赵义公瑞,又号辑卿。赵范、赵义父子于1600年开始动工兴建赵家堡,直到1633年内外城全部竣工,历时34年。

内城有“完璧楼”及宋城建筑特色夹墙,外城周围修筑四座城门,东门上有匾额“东方钜障”,西门上刻“硕高居胜”,南门上刻“丹鼎钟祥”。硕高内八景有泮派拱桥、翠芸亭榭、聚佛宝塔、仙人足迹、石棹石笋、翠榕小憩、宝伦石盆、猴井洞天。硕高城外十景有丹灶晴云、天马腾空、玳瑁前拱、鼎山旭日、石人插肩、沙漏鱼池、神龟献宝、溪环玉带、釜池暖暖、旗鼓捍门。

赵家堡的建筑处处流露着模仿北宋故都

开封的痕迹,如堡内有二水池,一清一浊,清者为杨池,象征忠臣杨家将;浊者称潘池,象征奸臣潘仁美。池边有一石桥名“泮派桥”,桥名即为纪念古都,因为开封在宋朝时被称为汴梁,泮派桥与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的桥梁结构相似。此外,模仿宋代汴梁的铁塔修建了聚佛宝塔,其高度为宋塔十分之一;模仿明代汴梁的禹庙塑响嵯嵯。尤值一提的是“完璧楼”的命名,暗合“完璧归赵”典故。这一切都显示了赵范、赵义父子对先祖功业的追思。柱上有楹联“宋室久播迁,一牒不随天下去;皇朝重举度,双麻曾向日边来”,联语也明白无误地表明了这一点。

赵家堡的建筑融入了佛教与道教的元素。“聚佛宝塔”是佛教的重要象征,《赵家堡族谱》记载:“聚佛宝塔位于西门内侧,咫尺玄门庙之边,由一个原始大石头上端建筑起来,底层为须弥座,边长1.1米,系实心结构四方形石塔,凡七级,高五米九十五厘米,1至5层塔座为四方形,四面有雕工精巧,风格各异不同的浮雕佛像,第六层四面各刻一个大象,连起来为‘聚佛宝塔’四字。”

道教元素除了内八景之一的“仙人足迹”外,还有外十景之一的“丹灶晴云”,此外还体现在南门匾额的命名——“丹鼎钟祥”,这与东晋道士葛洪有关。传说葛洪曾在硕高山之南的丹灶山炼丹,他路过赵家堡留下了足印,此事有诗为证,《福建通志》存有该诗:“杜冷烟寒雪满山,葛洪去后尚留丹。于今此地多芳草,处处花开玉干兰。”1624年,赵义应和其先父《山居》诗,写了一首《抱石上峰》诗,刻于堡内佛寺旁的石壁上:“何代仙人化,嶙峋海上山。叱羊应立,控鹤独来还。苔藓衣冠古,烟霞韵致闲。点头堪与语,对此欲招攀。”诗中“叱石成羊”的典故亦来自葛洪所著《神仙传·黄初平》。

赵家堡之所以能美名流传,得益于其主人赵范、赵义父子的功勋与仁义之心。1580年,户部郎中赵范奉旨督饷雁门,他积极修整工事、犒赏将士、慰问边民,赢得边境军民的称赞。他也因此获得神宗皇帝的褒奖:“立功赏,黄金百两,白银千锭,绮罗百匹,随往文武官员、运率兵丁各升一级。”(见《赵家堡族谱》)

1581年赵范擢升温宿道。温宿即今新疆阿克苏自治县,赵范在此地引导当地民众兴修水利、教授种植水稻,四年任满再次受神宗

赞誉。

1624年,漳浦闾邑士民为赵义立“建造苏坑桥功德碑”,《赵家堡族谱》记载了此事缘由:“忠信山后一溪名苏坑溪,明朝之时,因汇上流水源丰富,下距十里滨海,水深而能涨,造成交通不便,暴雨而成灾,辑侯公瑞公,独资建石桥,造福社会,造福梓里,漳浦县事陈以瑞及本邑士民镌刻石碑为纪念。”碑文中有“辑侯赵君……捐朱提百两,粟百石”字样。

1628年,荷兰海寇在佛潭白石港登陆大肆抢掠,赵义闻讯组织民兵予以抗击,荷兰士兵仓皇逃走。漳浦知县余日新特立碑褒扬赵义,此事记载于《官岭保障记》:“戊辰岁,海寇登陆,杀掠滨海,辑侯慨然散粟,纠义旗,破贼官岭,筑京观,里闾籍以安枕……辑侯以清人贤肯绳武象贤,于家为孝子,于国为忠臣,于乡为义士。”

《左传》提出人生追求有三不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谓不朽。”赵范、赵义父子虽然在立言方面未有著述传世,但是在立德、立功方面却有所建树,赵氏后人皆引以为豪。

赵家堡血脉绵延,不但勾连着过去与现在,从宋朝直到今天,而且连接着海峡两岸,连接着福建与台湾的血肉亲情。台湾赵鳌峰祭祠公业管理人赵国栋系宋魏王第31世孙,他在《兴建台湾桃园大溪赵家堡记事》中记载:“先祖若齐公(来台始祖,宋魏王第二十五世孙)为闽冲郡王之后,清朝乾隆、嘉年间随漳州乡人渡海至台湾谋生,在今苗栗县竹南镇中港溪上岸,初于三貂(今台北县贡寮乡)开垦,后至桃园大溪埔置田。”自2000年以来,他多次到漳浦赵家堡寻根,并依照福建赵家堡样式,“兴建赵鳌峰祭祠公业祠堂台湾赵家堡,一楼居安居,二楼完璧楼,三楼赵氏宗祠。外墙亦依福建赵家堡方位配置刻有硕高居胜、东方钜障、丹鼎钟祥等匾。”

在《祖源探索——寻根之路》一文中,赵国栋回忆自己幼年从贡寮到桃园祭祖,当祭祀结束的时候父亲端出一碗清水让自己喝下,并告知其意为饮水思源,正所谓水有本、水有源,兴建台湾赵家堡的意义就是寻根思源。而赵范、赵义在福建漳浦兴建赵家堡,不也是追思先祖的丰功伟业,并以此激励后人吗?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朱熹首仕同安

□黄大勇

今厦门市同安区在宋代是福建路泉州下辖的同安县。南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七月,朱熹出任同安县主簿兼主县学。正式任职时间为三年,因代任者未至,直到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十月才四考满罢归。同安是朱熹进士及第后的首仕地,他以极大热忱将自己的政治理想在此付诸实践。

同安县学始建于五代末,虽然历史悠久,但至朱熹到任时,县学已经衰败不堪:一是学校内部场所不完整,而且命名随意、功能错乱;二是教员数量少,一人兼多职,无法专意教学;三是学规学制不立,学生晨起入学,未及中午就散去,学生学习不追求义理只专意科举;四是图书不藏,县学已经88年未更新藏书,朱熹到任时只剩下一筐官书,没有藏书编目,随意摆放,残缺脱落。

朱熹到任后,首先是完善县学场所,更县学四斋名,明确各斋职能,建教课堂作为师生交流读书心得的地方,建经史阁作为藏书之所,建苏颂祠把当地乡贤树立为师生学习的榜样。其次是补充学校教员,寻访在当地有学识和声望的贤士徐应中、王宾、柯翰等人,并向县府申请徐应中、王宾为县学宾客,举柯翰为县学直学。三是确立学规学制,先后发布《同安县谕学者》《谕诸生》《谕诸职事》等,增修讲问之法,引导学生不要为了科举而被动学习,而是要主动探求义理之学。颁布《补试榜谕》《策试榜谕》,亲自主持策问来遴选县学弟子。发布《屏弟子员告先圣文》,将不合格或者违反学校规章制度和国家法律的学生坚决开除以儆效尤。四是增加县学藏书,整理县学原残存可读的图书六种,凡一百九十一卷,为其重新装订编目。征集民间藏书二种三十六卷,将其重新装订成若干卷。向福建安抚使方置写信,求得书籍一千余卷。

朱熹到同安任后,发现当时礼仪制度的执行存在上下脱节的情况,看到由于朝廷颁布的《政和五礼新仪》内容庞杂、自相矛盾、疏略不备等原因,难以被地方官府和民间接受,当地的释奠仪存在祭器样式不一、礼节不规范、祭服不统一等问题,而普通老百姓更是不知礼仪,特别是婚俗野蛮粗暴。朱熹在后来颁布的《申严婚礼状》中强调:“本县自旧相承,无婚姻之礼,里巷之民贫不能聘,或至奔诱,则谓之引伴为妻,习以成风。”

针对这些情况,朱熹首先修订释奠礼。他参考《周礼》《仪礼》《唐开元礼》《绍兴礼记》等画成仪礼、器用、衣服等图,让执事、学生朝夕观览,避免其临事出错。后来,朱熹在南康、漳州、长沙等地担任官职时,对在同安考订的释奠礼不断进行完善,并颁布行礼,终形成《绍兴州县释奠仪图》,由中央政府以政文的形式向全国颁布,成为各州县举行释奠仪的规范手册。其次是申严婚礼。针对禁止落后婚俗后,百姓结婚无程式可循的情况,朱熹向州府申请,把《政和五礼新仪》中的“士庶婚娶仪式”单列出来颁行,让百姓遵照执行。三是推广普及礼仪。针对当时朝廷礼仪难以向民间普及的情况,朱熹计划编撰适合州县官民的礼仪规范,并为之取名《绍兴纂次政和民礼略》。

弟子黄榦在《朱熹行状》中说,朱熹在同安“职兼县学,选邑之秀民充弟子员,访求名士以为表率,日与讲学说圣贤己治人之道。年方逾冠,闻其风声,已知学之有师而尊慕之”。朱熹在同安的弟子中,现有记载可查的有柯翰、许升、陈齐仲、徐元颖、许衍、王力行、许景阳、曾秘等人,这些人基本上都有向朱熹问学的书信或记录朱熹的语录存世,从中可以窥见朱熹早年的学术思想动向。

不仅如此,朱熹在同安以及离开同安后,吸引了大量同安周边地区的向学之士前来同安。清人李清馥在《闽中理学渊源考》卷十八《朱子泉州门人并交友》中列举了永春人陈易,惠安人刘铨、黄岩孙,晋江人杨至、杨履正、高禾、林彦,南安人李允宗、黄谦等一大批弟子,为此李清馥说:“朱子莅同安,阐明圣学,崇奖名教,泉之学士斌斌向风矣。”

朱熹在同安兴授徒讲学之风,使朱子后学在同安一直延绵不断,如吕大圭少师事陈淳门人王昭,复得文公道学之传,而丘葵又亲炙吕大圭之门。后来,同安学人建朱文公祠,就以朱熹早年在同安的弟子许升、王力行以及同安朱子后学吕大圭、丘葵等配祀。故清人王杰在《重修同安文庙记》中说:“朱文公来主是邑簿……日以与邑人讲论正学,从游甚众,其后吕圭叔(吕大圭)、邱吉甫(丘葵)辈皆接其薪传,同之人材奋发,六百载于兹矣。”

朱熹首仕同安期间,通过整顿县学、考订推广礼仪、兴授徒讲学之风,极大地改变了同安的人文风气,对同安社会文化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清康熙《同安县志》引用明隆庆《同安县志》说:“同安,自朱子簿邑以来,日以圣贤身心之学迪诸士,且推崇先进苏魏公,以为表率,故礼义、风行、习俗淳厚。去数百余年,邑人犹知敬信朱子之学。”由于同安文教昌明、人才鼎盛,得到了“海滨邹鲁”的美誉。

自朱熹离任后,同安“士思其教,民怀其惠,相与立祠于学宫”。宋嘉定年间(1208—1224年),同安知县毛当时在县学为朱熹建祠堂,并请其门人叶适为祠堂作记文。宋代同安县学司书兼奉祠的陈利用还将朱子在同安所作的诗文、问答等专门编为《朱子大同集》。元人林森生在《大同书院记》中记载,虽然当时距朱子去世二百年,但同安人对朱熹在同安所居的“高士轩”“古老相传,敬则必尊”,对朱熹在同安撰写的古碑“邑人能成诵之”。

同时,朱熹在同安的任职经历推动了其思想的转变。朱熹在同安以前学无常师,出入于经传,泛滥于释老,但任职同安后,决然皈依儒学。

一方面,朱熹在同安弟子的教学长期促进了其对儒学的理解,如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朱熹在为许顺子作的《存斋记》中关于“格物”“存心”的论述,被明人陈建认为“专说求心、见心、全与禅陆合”。朱熹在给柯翰的信中也说自“于致知格物之学,全无所发明。思吾国材精笃之论而不可得,临书慨然也”。后来,其在《答陈齐仲》中对“格物”“存心”的论述被奉为经典。

另一方面,通过对儒学理论的学习,坚定了其弃佛归儒的决心。朱熹出任同安时,禁止当地人出家为僧尼,而在当时二程理学为禁学的情况下,仍坚持在县学推行。这是因为他看到当地存在的现实问题,只能通过推行二程主张的“义理”之学才能够解决。

从中也可看出,在朱熹后来创立的庞大思想体系中,有很多内容是对主簿同安时期实践活动的延续和升华,比如对礼制研究与推广、对学校制度建设的重视。

乡土史记

莆田虎蹲冈义斋:七人登科的科举神话

□肖菊香 薛磊 胡立钊

莆田素有“海滨邹鲁,文献名邦”之誉,这得益于历代耕读传家的优良传统。从宋代的书堂到明代的社学,从清代的学院到民国的学堂,再到现今的中小学,代有人才出。宋代兴化县的虎蹲冈义斋便是莆田子弟“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的一个缩影,它虽只是一个私人学斋,却闻名远近,创造出七人登科的

科举神话。虎蹲冈,也有人称“寿峰虎蹲冈”。虎蹲冈的具体位置,据《莆舆纪胜》等书记载,“在兴化新县西清源西里”,即今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境顶村境内大会山仙寿峰山腰处。以往有学者以为寿峰虎蹲冈在涵江区庄边镇境内,这是因为新县镇仙寿峰与庄边镇寿峰交界,

且山名相近,很容易混淆。此外,还有人混淆了新县镇仙寿峰与庄边镇寿峰(在今莆田市涵江区庄边镇走埭村)。这个闻名的义斋一定是在虎蹲冈,一则有方晔(字仲诤,兴化士人,南宋绍兴十二年即1142年特奏名进士)诗句“义斋昔启虎蹲冈”为证。清康熙、乾隆两版《莆田县志》也指出“寿峰义斋在兴化县虎蹲冈”。二则,新县镇仙寿峰仍保留有古地名“虎蹲冈”。依靠当地村民带路,我们从新县镇境顶村出发,沿着大会岭古道通山而上,到达一个天然石洞“虎蹲冈”。据传,古时有老虎踞居此洞,因此俗称“虎蹲冈”。人可在此洞生活,据当地老人说,清时仍有人在此居住,洞附近有泉水,称“寒泉”。三则,《莆舆纪胜》将虎蹲冈列于仙寿峰之后,显然二者距离相邻、关系较密切。另外,据方氏族谱记载,义斋的主人方咏本居住在新县仙寿峰旁,后方氏一支迁居庄边寿峰附近,方氏后人方公霖(宋元丰二年即1079年进士)故居原在寿峰,今已成废墟,但方氏蒋山堂(以前称“寿峰从桂堂”,为方氏祠堂)遗址尚存于寿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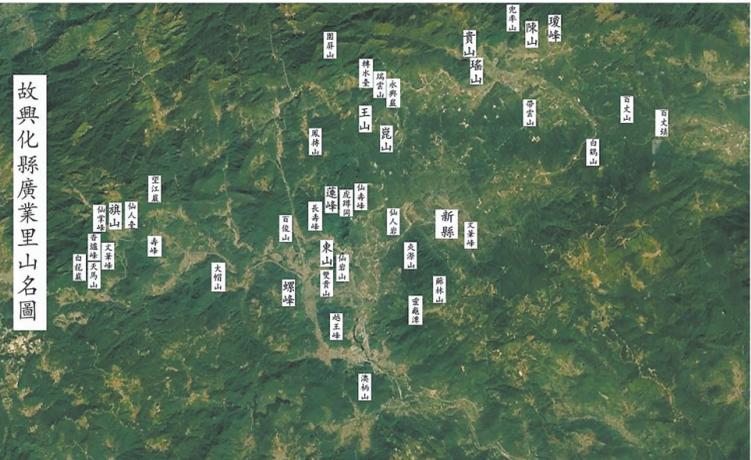
在虎蹲冈义斋设立之前,此地便有学塾。宋时,人们见虎蹲冈内有水源,高冈深壑松竹,是一处清静苦读之所,于是世家大族如方、薛等大姓,皆聚族内子弟到虎蹲冈学习,虎蹲冈书塾由此起。虎蹲冈旁有石厝两间(石厝遗址仍在,并有宋代古砖),或许是当时的教室。虎蹲冈义斋相关记载最早见诸宋李俊甫《莆阳比事》卷三,明林登名《莆舆纪胜·北境

远山》、明周华《游洋志·山川志》、明宋濂《翰苑续集》卷四、明周瑛《重刊兴化府志》卷十五、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卷四十五、清康熙《莆田县志》卷二、乾隆《莆田县志》卷二等也有记录,但文字皆有差异。

从文献学的角度来看,当以《莆阳比事》(年代最早)为据,而《莆舆纪胜》(地理专著,且作者为当地人)、《游洋志》(目前最早的兴化县志,且作者为当地人)亦有其价值,其他文献也可适当予以参考。

根据文献记载,虎蹲冈义斋基本情况是:宋天禧间(1017—1021年),方咏(一说其弟方洞亦参与)在仙寿峰虎蹲冈设置义斋供方氏子弟读书。义斋声名远播,四方贤士一年不下五十余人来此求学,如陈升之、夏竦、曾公亮等,与方氏子弟读书其中。据传,一天,山神献花七枝在案几上,预报呈祥。果然,陈升之、夏竦、曾公亮以及方次彭等七人被举荐,之后相继登第,后来曾公亮、陈升之二公官至宰辅之位,夏竦官至枢密使,方咏被赠朝议大夫。方晔有诗云:“义斋昔启虎蹲冈,一夕仙神报报祥。会客曾闻居屏席,应须重立相儒堂。”

除方氏外,宋代薛氏亦在仙寿峰虎蹲冈附近居住、求学。宋初,社会动荡,薛士安在山中闭门读书,十年不出。之后,士安礼贤敬长,忠孝仁义,率其子弟在溪东筑堂曰山房。薛士安子薛利和,字天益,陵墓在虎蹲冈旁的莲峰之上,谥忠宣。薛利和堂弟薛利,号寒泉,寒泉是仙寿峰上虎蹲冈旁的泉名,可见利为极有可能曾在此义斋学习过。



故兴化县产业里山名图 胡立钊制